

管子

白话今译

先秦诸子今译丛书

滕新才 荣挺进 译注

GUANZI BAIHUA JINYI

中国书店

管子

白话今译

先秦诸子今译丛书

滕新才 荣挺进 译注

GUANZI BAIHUA JINYI



中国书店

(京)新登字 213 号

本丛书顾问:启 功 郭预衡

《管子》白话今译

滕新才 滕 涌 译注

*

中国书店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 21.5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528 千字 印数: 00 001-10 000

ISBN 7-80568-563-0/B·84

定价: 17.00 元

导 言

管子（约前 725 年——前 645 年），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春秋初年齐国政治家。当今学术界也有人称他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法家的先驱、管仲学派的创始人”（杨宪邦主编《中国哲学通史》第一卷）。关于他的身世，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他早年很贫困，经过商，当过小官，与鲍叔牙为友。分取红利时，管仲擅自多拿，鲍叔牙知其穷困，不以为贪婪；打仗时，管仲冲锋在后，撤退在前，鲍叔知其家有老母，不以为怯懦；管仲曾经三次入仕三次被黜，鲍叔知其未遇时运，不以为不肖。鲍叔的赤诚相待使管子非常感动，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就是后世津津乐道的“管鲍之谊”，成为古人朋友交际的理想模式。

管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的剧变时期。周室衰微，大国争霸，强凌弱，众暴寡，局势激荡多变。襄公在齐国当政时，生活奢侈腐化，待人凶暴蛮横，诸弟唯恐祸及己身，纷纷流亡国外避难。次弟公子纠以管仲为傅，逃奔鲁国；末弟公子小白以鲍叔牙为傅，逃奔莒国。公元前 686 年，齐国发生内乱，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随后又被大夫雍廩杀死，一时国内无主，政治瘫痪。齐国贵族国氏、高氏暗召公子小白回国，鲁国同时也发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争位，并派管仲率兵守候在通往莒国的道路上。当公子小白经

星时，管仲引箭射中其带钩，小白惊呼假死，管仲飞报死讯，鲁军麻痹大意，从容进发。而公子小白在鲍叔牙保护下，倍道兼程，抢先回国，由国氏、高氏拥立为君，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践位后，鲍叔牙大力举荐管仲是宽惠爱民、治国不失权柄、忠信可结诸侯、制礼义可法四方的栋梁之才，如果要治国争霸，非管仲不可（《管子·小匡》）。于是桓公捐弃一箭之仇，从鲁国营救管仲回齐，任为宰相，执政长达40年之久，从内政外交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叁其国而伍其鄙”，确立行政管理体制；“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行军政合一的军事编制；经济上盐铁官营，铸造货币，实行“相地而衰征”的赋税政策；外交上改善同各国的关系，“轻其币而重其礼”（《国语·齐语》）。改革很快取得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功效，奠定了齐国雄厚的物质基础。针对诸侯争霸、戎狄入侵的局势，管仲又策略地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存邢救卫”，打败山戎，阻止狄人骚扰（附带说一句，“老马识途”这个典故就出自管仲北伐孤竹），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公元前651年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境内）之会，周天子也派人参加，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管仲由于其丰功伟绩，历来为后世所推崇。孔子曾经高度评价其“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事业，“人们至今还享受着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都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成为夷狄统治下的遗民了。因此孔子一迭声地称赞说：“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类似言论还可以在《淮南子》、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四书训义》等书

中看到。

至于《管子》其书，虽托名管仲撰，实际上却非管仲所著。书中有管仲与齐桓公对话径称“桓公”的记载（《山权数》），然人死方得称谥，管仲先死桓公两年，显然不会知道桓公的谥号（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书中又有关于西施的记载（《小称》），然西施乃春秋末年越国人氏，晚于管仲二百余年；书中还有关于梁国的记载（《轻重戊》），然魏惠王于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之后，魏国始称曰梁，其时距管仲谢世已将近三百年。前贤尚从思想内容不合、言辞鄙俗不合、常理推论不合诸方面认定《管子》其书非管仲所作，可参见苏澈《古史》、朱熹《朱子语类》、黄震《黄氏日抄》诸书。

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这样结论：《管子》中的某些篇章反映了管仲的事迹和思想，其成书早自战国，晚至西汉，非一人一时之所作，各篇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互相抵牾。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田氏夺取了齐国政权，继承和发扬了管仲的思想，实行变法，形成了管仲学派。齐威王、宣王时，曾在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稷门扩建学宫，招揽各国文学游说之士多达数千人，任其讲学议论，其中有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宋钐、尹文、鲁仲连、荀况等著名学者，因此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临淄成为战国时期的学术中心。《管子》其书绝大部分是管仲学派的文集，也掺杂了其他稷下学者的论述。书中关于经济的《侈靡》和《轻重》十九篇成书于西汉时期，郭沫若甚至准确地断定《侈靡》“写作于公元前一九〇年（汉惠帝五年）左右”（《侈靡篇的研究》，见郭氏《奴隶制时代》）；《轻重》十九篇（现存

篇)则有许多王莽时代的痕迹,“但作为《管子》轻重理论来说,则可以肯定是在西汉时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最迟在武帝时已大体形成”(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司马迁说他著《史记》时曾经“读管氏《牧民》、《山高》(即《形势》)、《乘马》、《轻重九府》,……其书世多有之”,可见当时《管子》其书已广泛流传。西汉末年曾经刘向整理,据刘氏叙录称,《管子》原书564篇,除去重复的478篇,实为86篇。刘向编定的八十六篇,后来亡佚十篇,实存七十六篇,这就是今本《管子》。

《管子》其书内容异常丰富,这里不妨引用近人罗根泽《管子探源》中的一段话:“《管子》八十六篇,今亡者才十篇,在先秦诸子,衰为巨帙,远非他书所及。《心术》、《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轻重》诸篇又为理财之语;阴阳则有《宙合》、《侈靡》、《四时》、《五行》;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诣。各家学说,保存最夥,论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博大精深,无出《管子》其右者,孔孟老庄申韩荀墨所不及也,以至于很难将其准确地划归于某家某派。班固《汉书·艺文志》列之入道家;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刘歆《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又《汉书·艺文志》孝经类著录《弟子职》一篇,儒家类著录《内业》十五篇,兵家类“省《伊尹》、《太公》、《管子》”。可见汉代已对该书分别著录,遽难定分。今人则视其为法家者流(《中国丛书综录》等),

哲学史家多冠之以“百家争鸣的高潮”。实则《管子》其书兼有道法两家之长而无其短，又掺以阴阳、兵、农、儒各家学说，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杂家，任何一家的思想均不足以涵盖本书的丰富内容，而又远非《吕氏春秋》、《淮南子》之属所能仰望项背。

《管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思想，核心则是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管子》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水有许多优良特性，并构成万物，甚至人的精神面貌也是由水决定的。从“人皆服之，而管子则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水地》）数语来看，当是后人概括管仲本人思想而总结的理论命题。后来管仲学派又把此命题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学说，认为万物都产生于“精”，“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这种精气与道有着共同的属性和作用，“气道而生，生乃思，思乃知”（《内业》）。而认知方式，则是“静因之道”的反映论，“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心术上》）。“静因之道”的实质是抛弃主观成见而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遵循客观规律。这种处心以静而御外物的观点，要求“洁其宫（心灵），开其门（感知），去私毋言，神明若存”（同上），与老子所谓“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老子》五十二章）的主张迥乎相反。

稷下学者中有不少人属于法家和黄老学派，《管子》其书的特点，“正在于黄老之学和法家相结合，而并非是黄老与法家两派著作的杂拌”，“按其基本倾向来看，正代表了稷下黄老学派与法家的合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这种合流客观上为法家的主张提供了哲学基础。

“静因之道”运用于政治，便是所谓的“圣人之治”，“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之，正名自治，奇名自废，名正法备”（《白心》）。为了实现这种“圣人之治”，必须“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任法》）。关键是任法，“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禁藏》）；“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任法》），这就纯粹是地地道道的法家观点了。法是一切事物的准则，但法的依据和标准却产生于道：“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于权，权出乎道。”（《心术上》）《管子》不仅强调以法衡量社会生活的一切，而且从理论上论证了法来源于道，这就把法家和黄老道学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管子》的政治思想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原则，内则养老抚孤，外则存亡继绝，上导国君于至公，下教百姓于规范，以期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管子》政治思想的特别之处，就是适应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趋势，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因此欲得民心，必须给予实际的利益，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轻徭薄赋，宽刑省罚，“民恶居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绝灭，我生育之”（《牧民》）。这种保护人民切身利益，满足人民正常欲望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思想。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人性问题乃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各个学派都参与了对人性的探讨，如道家的性自然说、墨家的性自利说、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等等。孔子也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并不否认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

属性。后世进步思想家如张载、王夫之、戴震等力倡“圣人只知节欲，不闻禁欲”，可谓深得前贤旨趣。至于宋代理学家奢谈“存天理，灭人欲”，提倡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实已违背其先师的初衷。相形之下，《管子》在奴隶制逐渐瓦解封建制刚刚萌生的春秋战国时代，就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进步的民本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从而成为古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先驱。

由“以人为本”的前提出发，《管子》不主张君主享有绝对的权威，“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形势》、《形势解》）。君主必须“修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以相逆也，则不失于人矣”（《小称》）。为了匡正君主过失，《管子》设想置大谏之官以监察，置啧室之议以纳谏（《桓公问》）。这种注重君德、强调监察的理论，与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人独以行法用术重势加强君权的主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管子》强调法治，就其性质而言，乃是指确定不易的程式和仪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准绳。其立法原则有三：顺民之好恶以立法（《形势解》、《明法解》），依自然之道以立法（《七法》、《心术上》、《版法解》），求简易划一以立法（《法法》）。《管子》所谓“法”的特质，具有公开性、平等性、强制性、稳定性、时宜性等特点，行法则以公正无私、信赏必罚为准则。“至其言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使法治与教育并行，精神与物质并重，此则非偏激之法家如商韩者流所能企及。”（徐汉昌《管子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

较之先秦诸子，《管子》其书的特出之处，还在于它是一部杰出的经济理论著作。其所谓的道，首先是与经济相联系

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管子》全书第一句话就是：“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更成为后世理财家贾谊、晁错等人的理论根据。齐国富有山海之饶，盐铁之利甲天下，且道路通衢，客商熙攘，具有发展工商的必要条件和有利因素。管仲之所以“世所谓贤臣”，其利在亲自操纵国家机器，清醒地认识国情，敢冒学理之大不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发展工商，本末兼赅，亦如当今中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富国动机一也。遥想二千五百年前竟有治绩如管仲者，实乃吾国之一绝也，儒墨道法各家皆拘于学理，未曾实际操戈，逊之管仲远甚矣。

《管子》主张盐铁官营（《海王》），铸造货币，掌握粮食，“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缗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缗百万”（《国蓄》）。商业经营必须由国家主持，牢牢把握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诸环节，洋洋洒洒的《轻重》十九篇就是国家控制商品流通的理论。《轻重》设计了国家控制商品流通的两个目的，一是防止贫富悬殊，二是增加财政收入，所谓“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同上），就是这两个目的的写照。为了实现第一个目的，需要稳定物价，“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圉可得而平也”（同上）。实际上，既要使国君拥有十倍之利，又要使物价平衡，仍然是双重目的的体现。而单纯追求第二个目的，则必须借重于国家号令作为控制商品流通的手段，人为地制造物价的剧烈波动以实现“一可以为百”、“无可以为

有”、“贫可以为富”（《轻重丁》）的赢利。《管子》还主张实行国家信贷，以取代私人高利贷，使“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国蓄》），“无什倍之贵，无倍称之民”（《揆度》）。

《管子》轻重理论以封建社会的商品流通过程为研究对象并作了全面的理论概括，实际上成了反映封建社会中国家商业资本和国家高利贷资本活动规律的理论。这种活动规律除了具有私人商业资本和私人高利贷资本的性质之外，还具有同国家政权的超经济强制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因此这种资本的威力要比私人商业资本和私人高利贷资本强大很多。

至于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管子》有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把奢侈挥霍放在第一位，“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侈靡是使人民效力君上的前提，富人侈靡可以使国君易于驾驭臣下，“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等，上下相亲”，因此要吃最美的佳肴，听最美的音乐，把蛋类雕画以后再煮食，把木柴装饰以后再焚烧，“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侈靡》）。更重大的意义还在于，侈靡可以增加社会的谋生手段，是扩大就业生存的途径，即所谓“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为了增加“贫者为之”的机会，《管子》主张厚葬：“巨瘞培，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食，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瘞藏。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同上）儒家也主张厚葬，但纯粹出于礼仪，而《管子》提倡厚葬则是一种经济理论，二者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一般说来，侈靡论产生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晚期。明朝中叶上海人陆楫（1515—1552）有“奢能致富”的理论：“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

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民必不易为生者也。”（《蒹葭堂杂著摘抄》，《丛书集成初编》本）陆楫的思想与《管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谓奢也，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这种理论比较全面地看到了生产、贸易和消费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究其合理内核则没有超出《管子》的思想范围。

《管子》的教育思想有以下特点：重视民众道德教育，以礼义规范百姓，务期教化成俗，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权修》、《八观》）；重视职业教育，士农工商务自分业，由其父兄言传身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小匡》），重视生活教育，尊师重道，求学读书，生活养成，待客有礼（《弟子职》）；重视军事教育，教习其斗志，教习其团结，教习其耳目（《兵法》、《小匡》、《九变》）；重视教育考核，“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立政》）。这与儒家提倡道德教育，发挥己身固有善性有所不同。

《管子》主张服人以义而不以兵，必不得已而用兵，亦先之以义，节之以财，而以伤于民危于国为戒。至于用兵之道，定组织，明赏罚，“正卒伍，修甲兵”，“作内政而寓军令”（《小匡》），“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重令》），以及各种具体战略，诸如谋攻、形势、虚实，地图、反间等等，《管子》亦先于孙吴尉繚而详尽言之。较诸先秦兵家者流，《管子》尤重士卒的教练与器械的利备。而提倡商战制服他国，则实为《管子》之独技。《轻重戊》记载了

五个寓言，皆诱以重利而废其农政，从而止其贸易绝其衣食，先后制服了鲁、梁、莱、莒、楚、代、衡山诸国，这已经具备了十五世纪西方早期殖民国家商业战争的某些特征。

限于孤陋浅薄，笔者对《管子》的理解实在太过肤廓，尽管吸收了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仍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本书以《诸子集成》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二十二子》本、《百子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和《四部备要》本。译注参考了唐尹知章注、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诸子评议》、戴望《管子校正》、近人章炳麟《管子余义》、今人郭沫若《管子集校》、赵守正《管子注译》等书。校勘多据《集校》，没有单独说明；《注译》赐便不少，往往启愚开塞。由于《管子》其书历时千载，简篇错乱，文字夺讹，词义古奥，颇多费解，连郭沫若这样的大腕人物也感叹“《管子》书号称难读”，笔者微末，学力不逮，鄙陋之处甚多，惶惶然诚待罪辞。

感谢主编李双先生为我提供这个检验国学功底的机会，他始终关注本书的注译，并提出许多指导性意见。乡贤荣挺进也参加了本书少部分译注工作，并为资料的收集做了大量努力；弟子邓大昀、杨楚生、杨宏、杜军诸君不辞辛劳，协助誊抄，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滕新才 滕 涌

1993年孟夏谨识于万州宁静斋

序

这套“先秦诸子今译”丛书，从时间上看，正赶上由《资治通鉴》白话本出版而激起的古文今译热潮。既是“潮”，那就该归为“显学”，这个名称总是不大入耳的。而且，在有的人看来，将典雅古奥的国粹糟塌成浅俗不堪的白话，无异于挖掘祖坟，粗鄙无道。只是这潮仍不可阻遏地热起来了，起码说，还有许多读者喜爱这种“下里巴人”的东西。我常想，既然老祖宗的东西各个时代都有人注，而且注得好的都成了大师，拿不大准的就多多益善地收罗先人的话充数，号称什么经“注我”；甚至自己不“注”一字，尽得风流，达到了“大美不言”的化境，不但免遭物议，反为同行相与乐道。那么，今天我们译成大白话，不妨也可以冒充成一种注罢。当然，大潮一起，免不了泛些泥沙残渣，恰如这套丛书免不了多有注译上的错讹一样；但潮落之后，大浪淘沙，或者会有精妙之作显露出来。

先秦诸子的时代，在我国历史上是读书人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最活跃、少束缚的时代，也是一个异彩纷呈、硕果累累、最为辉煌璀璨的时代。可以说，这个时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组成我们民族文化核心的儒、道、释三大思想宝库，就有两家半（因为佛教也中国化了）兴起于先秦。可惜自那以后，中国历史上就再没有重现过同样令人激动和向往的“百家争鸣”的自由壮观的局面。先有暴君秦始皇因惧惮

思想的伟力而“坑儒”，继以汉武帝为了“役心”的需要，采纳最善于给同类致命一击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百家终究只尚一家，儒家变成了儒教。更可怕的是其后近两千年，儒教与封建政体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形态，大大方便了统治者“动口”不行就“动手”，思想“教育”不奏效就施虐于肉体。于是，创造被扼杀了，“万马齐喑”成为不争之实。今天，欣逢大力提倡“思想再解放一点”的盛世，我们着手先秦诸子白话今译的工作，也是奢望以绵薄（精神的东西毕竟不如物质的来得直捷快当，此之谓“绵”；学养太浅，无能传其精髓达其要义，此之谓“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祖国曾有过的光辉时代，让更多的人歆享我们祖先创造的精神文明，让更多的人汲取菁华、走出蒙昧，为中华的复兴增添一分力量！

一个时期，反传统文化成为时尚。有的人动辄对传统文化大加挾伐，仿佛民国初闹革命，以为只要“咔嚓”一声将辫子剪掉，耳濡目染、浸淫五腑的封建污秽也随之而去。类似的“战斗”，从来没有成功过。“五四”时力倡“打倒孔家店”，现在不但没倒，香火还甚于从前。还有人辩护说那样做是为了“矫枉过正”，这不禁使人回忆起物质生产一“过正”就诞生“大跃进”的教训，我想精神文化的建设也不会例外。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传统”就是十全十美的（持此谬论者也大有人在）。只是，既然“传”诸后代而成为“统”，那就有它的合理性和它的生命力。传统文化固然与具体的时代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甚至无法弄清是它在规定政治，还是政治常常要利用它；但是，传统文化绝不等同于它们，它是更趋于永恒的东西（如果不是伪文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种

具体的政治体制被更进步的取代了，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增添新鲜血液，可以芟除与生俱来或在时间长河中衍生的赘物，但绝对无法结束它和取代它！退后一步说吧，来不及了解对象就挹伐所结出的果子，一定也与来不及了解对象就歌颂同样苦涩。这，也是我们译注先秦诸子的一个原因。

这套丛书，承蒙著名学者启功、郭预衡两位老先生的关心，我们深感荣幸。北师大中文系郭英德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吴龙辉博士对本丛书的组织编译做了大量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丛书最后由我审定。由于学力不逮，时间紧迫，加之译注者水平不一，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可以说，这套丛书如果还有可取之处，应该归功于学界前辈的指导和学养我只能望其项背的诸位先生的辛勤劳动；而它的所有不足，则应归咎于我的才疏学浅，力不胜任。

《先秦诸子今译丛书》主编 李 双

1992年8月21日于北京